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14

王权与神祇

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

下

[美] 亨利·富兰克弗特 著 郭子林 李岩 李凤伟 译

KINSHIP
AND GODS



上海三联书店



王权与神祇 下

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究

〔美〕亨利·富兰克福特 著 郭子林 李岩 李凤伟 译

KINSHIP AND GOD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权与神祇 / (美)富兰克弗特著; 郭子林, 李岩, 李凤伟译. —上
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9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 - 7 - 5426 - 3854 - 0

I. ①王… II. ①富… ②郭… ③李… ④李… III. ①君主
制—研究 IV. ①D03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5277 号

王权与神祇

著 者 / [美]亨利·富兰克弗特

译 者 / 郭子林 李 岩 李凤伟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540 千字

印 张 / 38.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854 - 0/K · 188

定 价 / 64.00 元(上、下册)

美索不达米亚



第五部分

王权的基础

第十六章 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的历史形式

215

1. 美索不达米亚的开端和原始君主制

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在埃及一样，王权出现在历史时代伊始，但是它的根源却更加深入地根植于非洲，而非西亚。在法老的后面，我们能够辨别出有关一位首领的原始观念，这位首领被赋予了超越自然力的力量，是一位“翻云覆雨的国王”。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君主制统治没有这样的基础，而王权在某种程度上是成问题的。它产生于社会环境的压力，这个社会最初并没有认可赋予单个人的权威。

最近已被证明了的是：¹在这个国家里，最古老的政治制度是所有自由民的议事会；他们把权力留给处理日常事务的一群长老；在紧急时刻，他们选出一位“国王”在有限的时期内掌管国家。整理并阐释有关“原始民主制”，这些分散但明确的痕迹使我们第一次理解了美索不达米亚王权的本质和演变过程。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最初的联合是地方的而非部落之间的。换句话说，出生地而非部族关系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然而，处理日常事务的长老们似乎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而是家族的首领，因为人们用苏美尔语的单词阿巴(*abba*)（“父亲”）来称呼他们。因此，在长老们当中，我们似乎拥有了原始民主制与以家族和氏族存在为基础的原始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联系。但是，尽管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原则，没有包含阻止其大面积扩展的特征，但原始民主制是不适于这样的扩展的，因为它承担着每一个独立地方的自治，并完全缺乏实施联合权威的机制，而且，它有某些自由的不利。促使议事会去行事一定是困难的，因为

216

由全部人向大多数人意愿的投票仲裁还不为人所知。通过一般性的讨论即“彼此问诘”，就像巴比伦人对它的表述那样，问题就被澄清了。²共同体的行动需要全体一致，而这只能通过劝说来实现。因此，对行动和领导权的需要培养了个人权力寄生性的成长，这种权力的成长最终毁坏了原初的统治制度。

我们刚刚描述的这种变化在早王朝结束之前完成了。我们想当然知道原始民主制在什么时候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达到了鼎盛；位于早王朝之前的原始文化时期³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半象形文字的泥板，在泥板上面，表示“长老”和“议事会”的标记出现了。⁴因此，制度存在于原始文化时代，而且宣称它起源于一个仍然较早的史前时代并没有内在的不可能性。

政治制度的盛行是以每一个独立地区的自治为基础的，尽管它不利于政治统一的发展，但也不一定毁坏民族凝聚的意识。政治上分开的希腊人完全意识到了共同的血统和共同的文化，并且有那种我们在类似的未统一的野蛮人那里获悉的“血亲意识”。^①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居民在神恩利尔的形象中表达出了他们的团结意识。在一首苏美尔诗歌中，一个黄金时代的记忆被下面这些词汇描绘出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蛇，没有蝎子……

没有狮子，没有野狗(?)，没有狼，

没有害怕，没有恐怖，

人类没有敌对。

在那些日子里，土地舒布尔(东方)……

不整合的苏美尔(南方)，“王权赦免”的土地，

鸟里(北方)，土地有需要的一切，

土地马尔图(西方)，安然休息，

整个宇宙，人们和谐地(?)，

用一种语言赞美恩利尔。⁵

① 见第 17 页。

恩利尔是一个国家神，而不仅仅是一位地方神。由于这个原因，包含他的主要神龛的尼普尔城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没有历史或政治基础。通常的解释假设存在一个所有线索都已丢失了的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尼普尔城是地区霸权的所在地。但是，这种解释似乎是千篇一律的。我们知道恩利尔在苏美尔受到了广泛尊崇，而尼普尔的威望完全可能是它的神所获得的尊敬的一种简单反应。人类过去的重要事件被定位在了尼普尔。在神圣的地区都尔—安奇即“天与地的连接处”，有“血肉产生的地方”，在这里，恩利尔用他的鹤嘴锄把地壳劈开了，结果“人类的先驱”能够“突破”地壳并生活于大地上。⁶如果平原首先有人定居时，恩利尔的神龛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是可以理解的，即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把国家神受到崇拜的中心地区称为他们的国家。苏美尔和卡拉玛（土地）都源自表示“尼普尔地区”之意的不同方言。⁷完全避免了政治力量的一个宗教中心可能实施的影响在德尔菲的事例中得到了研究。阿波罗的圣所受到所有希腊人的尊敬，而它的权威甚至得到了希腊邻人的认可。似乎尼普尔的恩利尔神龛在早王朝的美索不达米亚占据一种相似的地位。在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圣所都象征着并有时挽救一个国家的统一，后者是政治制度所不能体现出来的。⁸

犹如古希腊，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地的特征鼓舞了分离主义和离心主义倾向。早些年代在无边际的平原上出现的小居民点已经消失了。它们是孤立的单元，每一个单元由干旱的或灌溉的耕地环绕着，被宽广的沼泽地和沙漠与下一个单元分离开来，我们拥有关于大面积沙堆中居民点分散本性的明确证据，这些大面积沙堆是在萧条期从空旷地区吹来的，而且它们是我们在发掘中发现的，有时累积达几米深。⁹随着人口的增加，随着大规模使用金属引起的装备改进，相邻居民点的耕地连接起来了。因此，冲突必定会发生。拉伽什和乌玛之间的战争完全说明了这一点，¹⁰而且战争表明把独立的城市国家合并成无论多长时间的政治统一体都是不可能的。当时，一个城市，然后另一个城市都在发现自己，为了使自己的邻居臣服自己，并控制那块土地。但是，在几代之内，如果时间不是较长的话，强制执行的统一体便

会瓦解。

218 美索不达米亚决不是一个地理实体。甚至连强有力的亚述国王们也徒劳无益地试图到达自然的界限而浪费了人民的财力,在那个自然界限内,他们的统治权可能保持安全和稳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汇合进广袤无垠的阿拉伯沙漠中,平原东部边界的山脚逐渐上升到波斯和阿尔美尼亚山脉。没有这样的边界,即力量借其反冲,从而聚集到中心上来。在这一方面,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形成了鲜明对比,埃及由不可改变的边界确定下来(除了在南方)。一位在尼罗河谷扩展他的征服的地方首领注定会到达一点,在那里他不得不意识到他能够控制的所有土地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超越这一点的地方,他能袭击而不能征服。在这一时刻,有关一个单独统一的国家,即埃及王国的观念一定已经形成了。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将产生关于“苏美尔的国王”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之观念的自然地理等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联合。

他们土地的无定形性与阻碍美索不达米亚人民统一的政治制度的缺陷共同起作用。我们已经证明了原始民主制的弱点。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被采用以处理现存政府组织所不能处理的紧急情况。在早些年代,当受到严重危险的威胁时,议事会选择一位国王,并把议事会的权力授予他。甚至晚至阿卡德时代,议事会还感到自己有必要采用这样的程序:

在“恩利尔的公地”中,一块
属于埃萨巴德的土地,古拉的神庙,
基什人聚集在那里
而且伊普尔基什,一位基什人,
.....
他们产生了王权。”

国王的力量是伟大的。词汇“卢伽尔”即“国王”直接的意思是“伟大的人”。但是,这个词也被用来称呼一个奴隶的主人或者一块土地的所有者。因此,我们可以推定:社区完全把自己放在它的统治者手

中了。然而,得到理解的是,他的力量不会比危机更经久。王权的代号是一个巴拉(*bala*),这个单词意思是“返回”或“撤退”到最初状态;¹²而且国王权威的源泉是他由议事会选出来。因此,授予单个领导者的伟大力量意味着仅仅在短期内被实施。然而,在实践中,国家的疾病不可能被这样间歇的任命所治愈。只要居民点不再是小而孤立的,他们实施迅速而果决行动的需要便变成一种永恒的需要。城市和城市国家的形成增加了独立群体之间冲突的机会。排水和灌溉的需要使每一个社区依赖于与其邻人的合作。对于冲积平原的居民而言,进口诸如木材、石头和金属等大量原材料是必要的,而这又产生了保卫这些原材料畅通的职责。因此,被选出来的国王或某些能够执行准国王权威的官员们^①被迫保持连续的警觉状态;并因此,王权失去了短暂性。

变化也由其现任者的特征加深了,通过变化,王权变成了永恒的制度。我们可以设想被选出的领袖可能是长者们,他们的智慧使自己可以完成任务;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具有战士的锐气和魄力。两种类型的人都在古代文献中描绘出来了,尽管我们不得不到《旧约》中寻找对一位长者的完整描绘。我们知道很多巴勒斯坦城市由一个议事会和长者们统治着,而且有人已经指出:¹³在灾难战胜约伯之前,他的地位恰恰是一种原始民主制中长老的地位。我们必须记得议事会不进行投票,并因此采取一种行动,那仅仅是在关键的决定时刻,即当大多数人被一种劝告所动摇时。在那些条件下能够形成一致意见的领袖一定已经具有特殊的智慧、特殊的力量和命令性的语言。他一定已经享有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中,他的权威不会被强迫,也不会受到挑战,反而被接受为自然而有益的权威:

当我从我的大门走向城市,
并准备坐在广场上时;
年轻人看见我并离开了,
而老人们起身并站立着;

^① 见第221—223页。

贵族们停止了谈论，
并把他们的手放在了他们的背上；
贵族的嗓音是寂静的，
而且他们的舌头粘在了他们的颤上。

因为当耳朵听时，它使我高兴；
当眼睛看时，它为我证实：
我解救了渴望帮助的穷人，
和孤儿，以及没有帮助者的人。
他那打算死亡的祈祷向我袭来，
而我使寡妇的心欢快。
我增添了正义，而它成为了我的衣服；
我的正义像一条绳子和一条头巾。

220

因为人们听和等待着我，
并为我的建议保持沉默；
我讲话之后，他们没有回复，
而且我的话落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为了雨水等待着我，
并且张开他们的嘴，为了春雨。¹⁴

人们可能认为，如果这样一个人被短暂地装备以国王式的力量，那么紧急情况一过去，他就会卸任。但是，通常形势要求的不是约伯型的领袖，而是一位较年轻的人，他具有特殊的能力而在战争中享有领导权。理论上，这样一个人将尊重议事会和长老们的特权，而重要的是这种关系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描绘出来了，史诗反映了很古老的情况。吉尔伽美什是埃雷克永恒的国王；但是当他打算执行可能使城市卷入战争的行动时，他严格认真地向议事会和长老们寻求意见。¹⁵反过来，这些人又表现出了对他们年轻国王的伟大热爱，并且父亲般地给出建议。清楚的是，如果这种关系存在于现实中，那么它可能体现了一种最不确定的权力平衡，如果战争领袖从根本上打算控制权力

时,这种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这恰恰是我们发现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在巴比伦创世史诗中描述出来了,创世史诗告诉我们,受到混沌之神威胁的众神恳求他们当中最年轻、最有力量的马尔都克作他们的首领,以抵抗这群提阿迈特神。马尔都克回答:

如果我将成为你们的捍卫者,
消灭提阿迈特,并拯救你们,
那么聚集起来并宣布我的决定至高无上。
一起欢快地坐在乌布舒鸟奇那,
让我像你们一样,用语言决定命运。
结果我决定的无论什么都不会被改变,
而且我的口头命令不会(返回)到(我这里来),
不会被改变。¹⁶

在这些话中,我们听到了明显的野心和威胁的基调。马尔都克不仅仅向他的对话者表明议事会的召集是正确程序。他正在有效地宣称他的合作仅仅以绝对权力的代价来实现:他的命令不会被改变。

无疑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议事会经常发现自己恰恰面对着这样的情况。那些最适于在紧急情况下掌权的人们一定已经实施了权力,并在他们的职务期限结束时不愿意放弃权力。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一次危机的结束几乎并不意味着根本原因已经被消除了。然后, 221 并不奇怪的是,个人统治在美索不达米亚所有的城市中建立起来了。

2. 神 庙 社 区

只有少数早王朝统治者具有拉伽什这样的头衔。除了被选出的国王而外,还有其他官员,他们享有一种地位,即当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实施权力时便掌握了权力。他们是城市国家的高级祭司(*sangu mah*)和领导者(恩西)。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叙述了早期社区的世俗方面。但是,人类依赖于神的感觉渗入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生活当中了,而且每一个社区

都以一个或更多的神庙为中心。如果权力被赋予自由人的议事会,那么那种权力将依赖于众神威严的愿望。行使具有长老的议事会制度的同一群人为了政治目的形成一种社会宗教组织,我们称之为神庙社区。¹⁷

神庙社区表现出了强烈的民主特征。既然社会把其权威折射在了神的身上,那么成员之间便具有平等的义务;而这种义务需要如此大部分的正常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神权政治的共产主义。资源和劳力共享;工具和原材料由共同的储存库提供;农业产品、墓群和手工产品都在那些代表社区行使了职责和以神之仆人身份出现的人们中间分配。这样,美索不达米亚的神不仅仅象征着能够认可的神圣力量,也象征着社区本身。我们怎样解释这样的事实呢?即神拥有土地及其上的产品,无论地位高低人们都自然地每年在耕地、堤坝和运河上执行自己的任务,一个城市最动态的毁坏引起了城市女神的哀恸。¹⁸

社区(以神的名誉)拥有的土地被划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库尔(*kur*)土地,被分配给耕种它的社区成员,为其提供生活必需品。这些份地的规模相差极大,但是即使最小的份地也几乎达一英亩,维持一个人甚或一家人都足够了。土地的另一部分留给神,例如,在某个案例中这部分土地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部分土地被称为尼格纳(*nigenna*)土地,而它的产品被储存在神庙中。所有的社区成员,不管其职位或职责如何,都有义务耕种土地,并在堤坝和运河上服徭役以确保土地的灌溉。用于这些公共任务的工具和牛或者驴队被存放于神庙的厩和仓库中;它们明显归整个社区所有。用于播种的谷物也由神庙提供。不仅仅耕地的产品,还有工具、仪式装备和人们必需的给养或牺牲的动物同样都是神庙财产。而且,社区成员认可为神服务,从而执行其特殊技能的义务,金属加工工人、石工、木匠、船夫和渔夫、园艺人和牧人都要为神庙工作一定的时间,或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然而,所有这些人主要是在分配给他们的库尔土地上工作的农业工作者。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不仅仅为社区实施技能,还为私人贸易和交易实施技能。这样,个体实业在某个范围内建立起来了。事实上,第三类神庙土地(乌鲁拉[*urula*]土地)出租给私人耕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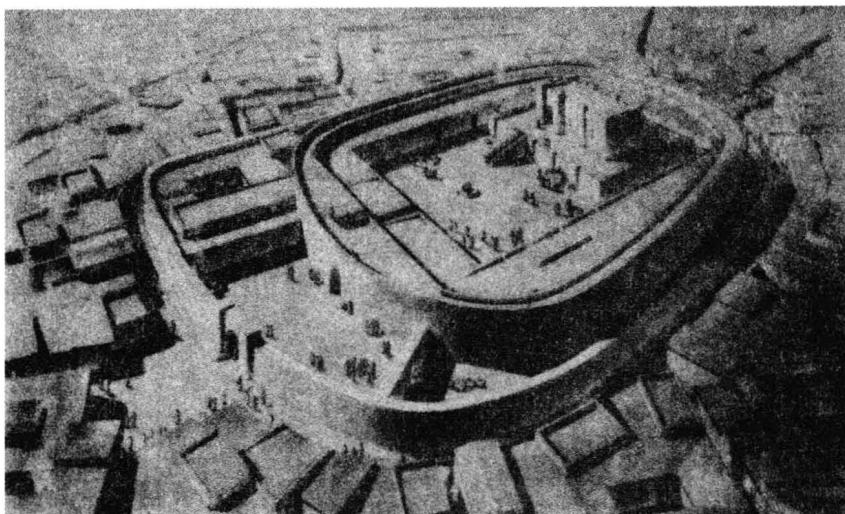


图 42 位于哈法耶的早王朝神庙

我们对神庙社区运行的洞察源自文献。但是在哈法耶椭圆形神庙的挖掘¹⁹为历史的重建提供了特殊实物。我们注意到了人们是怎样围绕着他们的神龛居住的，神龛超过房屋的高度，街道向这一焦点聚拢。仓库环绕着圣所的内庭和平台。在两个围墙之间的外庭一边的建筑物或许由指挥神庙社区事务的高级祭司占据。他亲自监督土地和耕地界限的划分。他也监督土地的分配，并授予尼格纳土地和运河上个人的徭役任务。

我们通过早王朝文献了解到的城市和城市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由几个神庙社区构成。拉伽什的泥板提到了二十个神龛；²⁰发掘出的早王朝城市哈法耶的一部分包含两个大规模、一个中等规模和两个小规模的神庙。²¹作为一个单个社区规模的例子，我们可以提到拉伽什的巴巴神庙社区，它有 1000—1200 人构成，并拥有大约 6000 英亩的土地。²²城市国家的总人口只能用一般的方法来计算，但它似乎在 1000—2000 人之间。²³

正如神庙社区被看作是一位神的地产一样，城市整体上也被一位神——即城市神拥有。这个神拥有最大的神庙社区之一，而且他的高

级祭司是城市的统治者(恩西),掌握着城市各部分的联合。单个的社区在形成城市国家的融合过程中丢失了一些独立性,而且为每一个神庙社区分派公共任务是统治者明显的职责,而每一个社区的高级祭司都分散于这些成员当中。统治者处理灌溉和贸易事务,据说贸易已经构成了对外政策的一个领域。

在统治者地产的组织中,某些特殊形式的社区控制统治者几乎不可能了。例如,他从每个神庙的尼格纳土地上获得大部分收入和口粮。²⁴既然这些耕地作为一种徭役而被社区的成员耕种,那么在任何时候都很难说这种义务劳动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是服务于神庙即整个社区的,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仅仅是增加了统治者的财富。

统治者与国王有区别,因为他是一位永恒的而非短暂性的官员。然而,与国王相像,他发现自己行使了伟大的权力。必要的是如果社区要繁荣发展,他将会这样做。但是无可非议的进取与非法扩张之间的分界线一定经常难以划出。在早王朝末期,拉伽什的乌鲁卡基那描述了他终止了的某些权力的滥用。例如:“众神的牛犁了统治者的洋葱地,因为统治者的洋葱地和黄瓜地位于众神优良的耕地当中。”²⁵这些权力的滥用是美索不达米亚统治权模棱两可起源的自然结果。它已经满足了原始民主制机制所不能满足的一种需要。复杂而大为扩展了的城市国家政府需要比自由人议事会或长老团体能够给出的更为强有力领导权。国王、强有力之神庙的高级祭司和城市国家的统治者都处于可以满足那种需要的位置。到早王朝时代为止,在每个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这些官员当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位统治者了。

3. 证明传统未中断的统治者称呼

我们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王权形式的平淡信息需要辩护。人们完全会问,是否一种政治制度在无政府状态和中央集权之间一连串间歇性变化中能够保持一种明显的特征,而那些间歇性变化形成了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对这些疑问的最终答案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找到。我们可以通过从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不同时期引用证据阐明我们的

观点,这一事实表明了完全确定的王权观念的持久有效性。然而,事实是,另一种观念也出现在我们的资料中了;而且我们这里将为我们的处理方式作初步辩护,即把一个观念作为典型,而把另一个作为非典型的,甚至异常的。当我们考察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的称呼时,对比很容易地展现出来了。

神圣的限定词

文献中,位于很多国王名字之前的是神圣的限定词。这种风俗受到其影响范围的严格限制。这样,著名的第一位国王是阿卡德的那拉姆辛;而且这一风俗被乌尔第三王朝(除了第一王朝)的所有国王所遵从。那个王朝崩溃之后,伊辛的国王们和这个国家再次分成的其他城市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偶尔也在他们的铭文中带有神学符号。例如,我们从埃什努那的几个国王那里注意到了这种符号。²⁶ 拉尔萨的里姆辛在他统治的第二十三年采用了这种神学符号,²⁷ 但他的伟大敌人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却从未采用它。沙穆苏伊鲁那和他之后的几位卡希特统治者是最最后一些称自己为神的统治者。既非亚述人也非新巴比伦人更新了这种风俗。

这与埃及形成了突出的对比关系。在尼罗河谷,一位神在所有的时代都必然是国王;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发现在公元前 2300 年到公元前 1500 年间,不足 20 位统治者在书写他们的名字时宣称了神性。毫无疑问,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必定在本质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限定词的确切含义仍然成问题。我们将看到大多数通常被演绎为国王神化的证据,事实上并未说明这一问题(第二十一章)。然而,伊辛和乌尔的国王们在其中作为神圣新郎的一个仪式证明了正字法的用法,或许还解释了它的起源,我们将看到这一点。

艺术比正字法和仪式更少地表达了神化。那拉姆辛也给我们留下了图画证据,表明了他的超人性受到了严肃对待。这是在他的胜利碑上发现的。国王戴着众神的角状王冠;在尺寸上他超过所有其他的人物,这在埃及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用法,但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却不是这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相对于埃及的法老,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在本质上与人们没有什么不同(见引言)。胜利碑的整个文字用一



图 43 纳拉姆辛胜利碑(卢浮宫)

“闪米特”亚述人中间完全不为人知晓。但是，国王的神化也不是“苏美尔人的”；²⁹最古老的苏美尔文献忽视了它。它们揭示了原始民主制的流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国王的神化有限地发生是一种异常，我们不能充分解释这种异常。在我们特殊的调查领域，它表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基本的复杂性，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中，某些因素可能有点独特。这不是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缺乏整合性或内在一致性。相反，它具有自己的明显特征，尤其在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事件中。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希腊和伊斯兰的历史对古代近东的历史地理产生了不幸的影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是真正本土性的，而且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晰了，即人口的迁徙和外来影响只能偶尔地干扰，而不能总是改变那些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文化连续性。然而，一个例外是在公元前 3 千纪的后半期，讲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的阿卡德人取代了